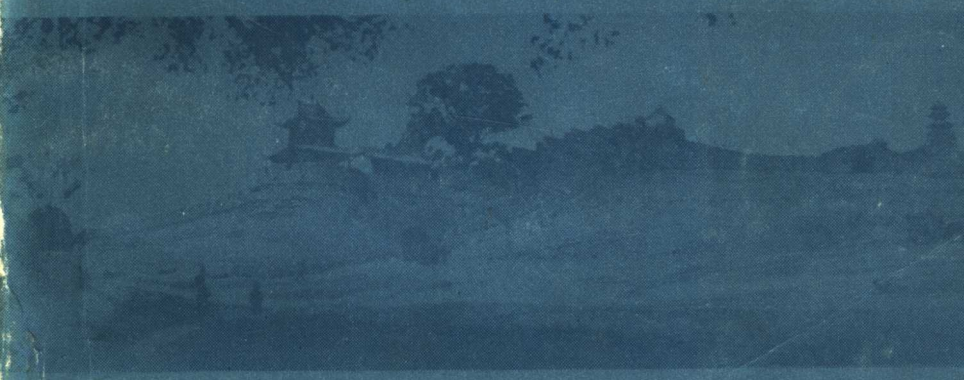


阿拉善盟文史第五輯

德王在阿拉善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阿拉善盟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封面设计：朝格图

德王在阿拉善

《阿拉善盟文史》第五辑

编辑：阿拉善盟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印刷：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印刷厂

开本：850×1168/32 字数：23万 印数：1500册
1988年7月第一版 1988年10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NXTZZ88—60 定价：2.95元

出版说明

《阿拉善盟文史》是阿拉善盟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办的不定期史料集。本册汇编了我盟、旗政协委员及各界人士撰写的有关德王在阿拉善旗组织“蒙古自治政府”的回忆录以及根据档案资料撰写的文章、论著等，供内蒙古近现代史研究者、文教界和史志爱好者参考。

由于撰写者的经历及水平所限，加上我们编辑力量不足，难免有一定的局限性，希望知情者、各方读者予以补充、订正，使之更加完善。

另外，尚要说明的是，由于篇幅所限，以下几篇稿件未能选用：吉致祥著《西蒙古自治运动始末》、张兆荣著《“蒙古自治政府”的组建与覆没》、朝格图著《德王其人》、《德王在阿拉善旗组织“蒙古自治运动”综述》等文章，特请谅解。

应我会的委托，本辑资料的组稿、收集与选编是由朝格图同志完成的，在此谨致谢意。

阿拉善盟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

1988年5月于巴彦浩特

目 录

从德王的反动政治活动看其哲学思想·····	新娜 陈红艳 (1)
我所搞“西蒙自治”运动经过·····	德穆楚克栋鲁普 (13)
赴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经过·····	德穆楚克栋鲁普 (46)
德王在阿拉善的“蒙古自治”运动前后经过·····	路 闻 (69)
对《“西蒙自治运动”始末纪要》一文的质疑·····	戚 涛 (145)
“西蒙自治运动”始末纪要·····	何兆麟 (159)
德王在阿旗组织“蒙古自治政府”的历史背景·····	戚 涛 (178)
略谈“西蒙自治运动”·····	杨永忠 (197)
内蒙自治政府始末记述·····	郭恩布礼布 (216)

附 录

抗击德李残部的亲历记·····	段塔拉腾岱 口述 段图布新巴雅尔 整理 (234)
新一旅西窜及在阿拉善投诚经过·····	苏庆阿 (247)
德王搞蒙古地方自治运动的片断回忆·····	徐厚田 (256)
“西蒙自治”一词的由来·····	戚 涛 (267)
德王年表·····	陈红艳 新娜 (281)

从德王的反动政治活动 看其哲学思想

新 娜 陈红艳

在蒙古现代史上，“自治运动”颇有影响。德穆楚克栋鲁普（1902——1966年）（以下简称德王），之所以能成为内蒙古现代史上显赫一时的人物，是因为他导演了一场所谓的“蒙古自治运动”。研究德王，对于了解整个蒙古现代史，深刻地认识历史的内在逻辑和规律性，起着很大的作用。

哲学是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总结和概括，任何人的一切实践活动都离不开哲学思想的指导。为什么德王与“自治运动”结下了不解之缘？为什么这个导演了近二十年的政治运动最后以失败而告终了呢？对此本文欲提到哲学角度，试做些分析、探讨。

（一）

我们知道，德王的政治倾向表现得比较明朗，这样，就使我们能够比较清晰地看出他的整个政治活动与其哲学思想的内在联系。

德王生涌的年代，是中国灾难深重、生死攸关的年代，也是中国各族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空前激烈的年代。在这个时期，近代蒙古社会的三个基本矛盾，即内蒙古人民与外国帝国主义的矛盾、与国内反动统治阶级的矛盾以及与本民族内部封建势力的矛盾，发展到了异常尖锐的程度。1919年，刚满18岁的德王，根据

蒙古王公世袭制度的规定，承袭为苏尼特右旗札萨克亲王，1924年任盟长，从此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在十月革命影响下，1919年我国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这对于正处在北洋军阀残酷统治下，又面临遭受帝国主义奴役威胁的广大内蒙古人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内蒙古地区的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浪潮，从此更加高涨。

时代的风云，无时不触动着德王的政治琴弦，在全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德王有何打算呢？他狂妄声称：“当今之世，能出而收拾蒙古事者，舍我而其谁与归？”①德王一方面想利用民族民主革命运动达到自己的政治野心，另一方面又不想使蒙古封建制度受到损害。于是，他主张“改革蒙古社会的陈规陋俗”，提出四条改革的措施：一、普查全旗人口；二、号召不懂经文的青年喇嘛还俗；三、兴办中、小学教育和卫生组织；四、加强蒙旗保安武装组织力量。这一切既引起一些因循守旧的老王公、贵族们的反对和不满，同时，也赢得了不少力图改变蒙古贫穷、落后局面的蒙古青年的支持和赞同。从此，德王便成为蒙古地区的风云人物，他的一系列政治活动均引起了外界的注视。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蒙各盟旗相继沦陷，德王看到此况后，认为“日本的‘满蒙政策’是要掌握全蒙古，得了东蒙以后，必然会入侵西蒙，而南京的国民党政府，并没有在华北御敌的任何准备，当然也就更无力顾及到边陲遥远的蒙旗。在此内外环境急剧变化的矛盾中，如果能联合各盟旗封建王公及其上层分子，结成一个有组织的较大的蒙旗力量，与国民党政府进行勾搭，讨价还价，必然能得到更多便宜。”②于是，便开始大肆进行政治活动。他在北平、南京等地，结识了许多蒙古知识青年，势力逐渐扩大。回旗后，即成立一支蒙古干部学生队，“着手培养人才和力量，备作待机而起的政治资本。”③

1933年春，德王与其帐下青年研究“在当前形势下解决内蒙

古出路问题的办法”，提出实现“蒙古高度自治”的方案，经一番酝酿，于1934年4月23日在百灵庙举行“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简称蒙政会）成立典礼。他任秘书长，掌握蒙政会的实权。

随着日本势力向华北和内蒙西部地区的推进，德王与日本方面接触逐渐增多。本来，他在百灵庙“蒙政会”成立前后，想取得蒋介石政府的支持，以扩充自己的力量，但蒋介石的民族压迫政策，使他认识到此打算是无望的。1934年8月，德王的得力亲信韩凤林被国民党方面暗杀，加之他与绥远当局在某些问题的冲突中失败，因而他与国民党方面的矛盾日趋尖锐，对蒋的幻想破灭，从此开始了“多边外交”，与日本方面进一步接近。1935年冬，德王亲自出马去伪满洲国新京（长春），和日本方面勾结。在日本的怂恿和支持下，1936年成立了“蒙古军总司令部”，他任总司令。但在总司令部的架子还未搭起来之际，百灵庙“蒙政会”保安总队队长云继先等因不满德王的投日活动，率千余人武装倒戈，使德王苦心经营多年的军事力量，遭到严重摧残。同时，国民党政府又趁机削弱其势力，至此，百灵庙“蒙政会”瓦解，这就更促使他对蒋介石政府不满而进一步投靠日本。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芦沟桥事变，日本侵略者为集中力量攻平、津等地，对察、绥方面没有顾及，傅作义乘机向察北蒙古军发动进攻，德王军队惨败。从此，他对投靠日本进行分裂活动，来实现统一独立之举，产生怀疑和动摇，觉得“周游世界各国，宣传蒙古问题，把蒙古问题提到国际政治舞台上，依靠世界各国解决蒙古问题，比靠日本一个国家解决蒙古问题好”④的话有道理；准备与日方分手，经人劝说，才消除此念。不久日方又派其部队与蒙古军共同反共，“蒙古军政府”移至归绥市（现在的呼和浩特市）。在“蒙古军政府”成立之时，察南、晋北，也都成立了自治政府，日寇为加强其控制，指使三家“合而为

一”，于1939年成立“蒙疆政府”。德王认为“蒙疆”仍意味着是中国的边疆，不是独立的蒙古政权，因而策划反对，但日方并未改变态度。德王尝到寄人篱下的苦滋，打算另寻出路，结果又与蒋方联系，蒋介石嘱咐他“忍辱负重，以图将来”^⑤。1938年、1941年，德王曾两次访日，乘机为建蒙古国进行分裂活动，经几番讨价还价，1941年宣告成立“蒙古自治”。其实，日寇对德王只是利用而已，德王充其量不过是个工具，1945年随着日寇的跨台，“蒙疆政权”也寿终正寝了。

日本投降后，德王又与蒋方联系。蒋介石在日本投降后不久，虽对蒙古问题有允许自治的许诺，但实际上是个空头支票。当德王在重庆见蒋介石并提出自治问题时，蒋却以“无暇顾及”否决之，德王无奈，从此遵命到北平隐居。在北平隐居期间，他一方面与蒋介石联系，另一方面又与美帝勾结。他曾与美国学者拉铁摩尔、美使馆人员等会晤。德王认为美国有原子弹和强大的武力，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必定取胜。在解放前的1949年，德王又返回内蒙古酝酿自治。他认为“蒙古人一向要求自治”，但总没有实现，“现在国民党自顾不暇，没有力量来管这些事，我们不管他答应不答应，应该乘机进行，现在是最好的机会，不应该错过”。^⑥经一番筹划，于1949年8月5日“蒙古自治政府”在阿拉善成立。此时的西北局势已十分紧张，国民党政府分崩离析，人民解放军正向西北挺进。1949年9月绥远和平解放，形势对德王等人越来越不利。因此，他主张迁“自治政府”到西沙漠处，为此与其他人发生意见分歧，几经争论，双方各持己见，他于9月20日出走外蒙，余下的人宣布西蒙“自治政府”起义。1950年2月27日，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将德王逮捕，同年9年将他引渡回国，德王导演了近二十年的“蒙古自治运动”至此告终。

(二)

“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⑦，德王政治活动的轨迹为我们寻其思想脉络提供了可靠线索。

从上述的史实中可以看到，德王给人突出的感觉是善于变化。在五四运动的冲击下，在反帝反封建的口号声日益响亮的时候，他提出“改革旗政”；“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在内外局势急剧变化的关头，他乘机搞“百灵庙自治”；“塘沽协定”后，日寇势力向华北和西蒙地区不断推进，他搞“多边外交”；日寇势力渐强，他又投入日本侵略者的怀抱，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扶持下建立“蒙古军政府”、“蒙疆政府”；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在北平隐居期间又与美帝国主义勾结。总之，德王一生穿梭于各种势力之间，沉醉于各种演说之中，但不论是与蒋介石合作，与日本勾结，还是与美国联系，他都万变不离其宗——致力“蒙古自治运动”，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我们是以蒙古为前提的，谁对蒙古有利，就跟谁合作。”⑧

至此，人们不仅要问：为什么德王与“自治运动”结下了不解之缘？这的确值得我们探究。

我们知道，德王出身于封建贵族家庭，自幼接受的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他常以成吉思汗第三十世孙自居，把复兴蒙古做为理想，把自己的命运与封建制度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他个人的抱负，也表现出强烈的阶级色彩。他初入政界时，封建王公制度已面临新势力的挑战，阶级利益使他本能地梦想依靠封建制度实行自上而下的改良，以维护本阶级的封建统治。他早年的“改革旗政”，就是这一思想的具体表现。

关于“蒙古自治”，早年有人做过如下分析：“北伐后，革

命思潮，澎湃全国，打倒封建制度之呼声，甚嚣尘上，内蒙先进人士因受新思潮之激荡，谋攻盟旗；而王公中亦有因惧传统政治之被推翻，欲图改革以自保者。两种不同心理之推动，故……有派遣代表60余人组织查原因之举。”⑨这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德王搞自治的动机。众所周知，自封建清王朝到德王时代，蒙古民族所处的地位十分低下，倍受民族剥削和压迫。国民党政府“二十余年以来，直视蒙古为外府，设省设县，土地瓜分几尽，日党日政，主权侵蚀无余，以致蒙古生计日窘，盟旗凋零不堪，即无以自存，更何言其平等。”⑩总之，民族压迫导致民族仇恨，蒙古人民与国民党反动派的矛盾已十分尖锐，在民族问题上，德王等封建王公与国民党政府也有利益冲突。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蒙古自治”成了德王最得意的法宝。德王的所谓“蒙古自治”，实际上只是个手段，其真正的目的在于建立封建的“蒙古帝国”。为实现这一目的，德王竭尽了全力。在解放的炮声阵阵、革命的红旗四处飘扬的1949年，他仍回到大沙漠里搞他的“自治运动”，这就是最好的证据。作为封建阶级的代表人物，德王为了自己的利益和命运，这样热衷于搞“自治”，是很合乎逻辑，不足为奇的。

德王为“蒙古自治”奔波一生，可谓耗尽了气力。但为什么会以失败告终呢？这又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历史是无情的。在社会发展的潮流中，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德王搞“蒙古自治”活动，正值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浴血奋战，反对投降卖国，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之时。在这个伟大的斗争时代，是否反对日本侵略，拯救祖国，振兴中华，是否反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顺应历史潮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任何社会运动和个人行动的试金石。德王这一时期的活动，是经不起检验的。他的“蒙古自治”主张，是逆中国现代历史潮流而动的。

乌兰夫同志在1947年总结内蒙古自治运动的历史经验时指

出：“内蒙古自治运动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两条道路的分歧和斗争，一条是反动的封建上层分子的道路，一条是蒙族劳动人民的革命道路。这两条道路的根本不同点在于：前者投靠帝国主义与大汉族主义，不顾民族的死活求得个人利益，出卖民族利益，后者对帝国主义与大汉族主义不抱任何幻想，坚持民族利益，坚决同敌人进行斗争；前者反对发动与组织人民群众，害怕群众，后者主张实行民主，一切依靠人民群众，并对一切爱国人士采取团结的方针，前者把自己掌握的武装变成压迫人民的工具，不与敌人进行武装斗争，后者从来就把武装斗争看作敌对斗争的主要形式，发动人民建立革命武装；前者打着“独立自主”的旗号，实际是投靠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后者主张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坚持维护祖国和民族的斗争；前者不顾人民的疾苦，向人民榨取剥削，后者主张改善人民生活，减轻人民负担；前者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反对联合国内各族人民，后者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团结国内各族人民共同进行斗争。”⑪这是尖锐而深刻的总结，道出了问题的实质。

阶级的局限性，必然导致思想的局限性，产生错误的指导思想，形成错误的组织路线。德王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一个代表人物，阶级属性决定他惧怕革命，竭力维护封建统治，不相信广大人民群众，也不可能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真正支持。于是，他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外部势力上面，象赌徒一样将自己的命运时而抛给甲方，时而又抛给乙方。国内外反动势力，对德王的“自治”都是各怀鬼胎的，不论是国民党，还是日本和美国，他们或是利用德王牵制共产党，或是利用德王来推行侵华政策，这样，就使德王的路越走越窄。与此相反，乌兰夫、奎璧等当时的蒙族先进青年，在积极从事蒙古民族的解放运动中，相信马列主义的民族观，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从而使“内蒙古革命运动成为中国革命运动的不可分离的一部分。”⑫随着社会主义在亚洲的胜利

利，1947年蒙古人民终于成立了自治政府，为民族繁荣开辟了道路。上述事实告诉我们，错误的指导思想，必然导致失败的行动，德王一生的悲剧，是历史必然。

(三)

“人们将选择哪一种哲学，这就看他是哪一种人。”^⑬在阶级存在的社会里，哲学总是一定阶级或阶层利益、愿望和意志的理论概括和反映。历史上的哲学思潮和派别，虽然各种各样，但都生长于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归根结底都是为一定阶级或阶层的政治主张提供哲学依据的。

综上所述，德王的政治活动，鲜明地表现了他所代表的那部分封建王公的特征。他对蒙古保守派不满，主张改良，但对革命派又害怕，反对变革；他要革新，却又留恋旧的，原地打转；他要正视现实，却又无力把那些相互矛盾的思想组织连缀在一起，他的矛盾是他所处的社会矛盾的反映。但保守性、反动性在他思想中占了主导地位，因此他的哲学体系也必然是保守的、唯心的。

德王作为封建王公的思想代表，政治上走的是一条脱离人民群众、对抗革命的反动道路，这与他思想上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是一脉相承的。德王一生的所作所为，是他抗拒历史潮流，用孤立、静止的观点认识问题的形而上学思想和主观唯心主义世界观在政治上的具体体现。

首先，德王所从事的“自治运动”，是他主观唯心主义思想的产物。

德王出身于封建王公，从小在封建思想意识的熏陶下成长，他常以复兴蒙古帝国为已任，提出“继承成吉思汗之太无畏精神”、“完成民族复兴大业”等口号。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原理告诉我们，阶级利益决定其阶级的思想家在他们的时代用

什么哲学理论作为斗争的武器。为了维护封建王公的利益，为了能够替他们的统治辩护，德王自然要承袭蒙古哲学史上的“天命论”思想。

我们知道，中国哲学史围绕着天人关系，经历了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早先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对客观的异己力量感到无能为力，所以对天加以崇拜。随着人们抽象思维能力的提高，则出现了“天道”、“天命”等哲学概念。这些作为哲学概念的“天”，不外乎有以下三种含义：一是指物质之天，这是唯物主义者所坚持的；二是指人格神上帝，这是宗教神学的观念；三是被视为物质世界之外，至上的绝对精神——“理”，这是唯心主义的主张。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往往把他们的行为说成是天的意志，把天人合为一体。正象郭沫若同志所指出的那样，“中国自奴隶社会成立以来，地上王的影子投射到天上，成为唯一神的上帝，率领百神群鬼，统治着全宇宙。”⑭

德王的一些演说、宣誓中常有“金石可破，此志不渝，皇天厚土，人神共鉴”⑮，“太祖有灵，当护佑之”⑯，“在神佛照鉴下，愿本建设精神……向建设东亚新秩序迈进，以期巩固建国之丕基于永久”⑰等话。这些都说明德王的世界观受到了传统的“天命论”的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之间没有区别。值得指出的是，在成吉思汗那里，强调的是客观精神的“天命论”，坚守“赖长生天之赞力”的信条，把天当作有意志、有人格的上帝来信奉，作为巩固他的黄金家族的统治思想。这是典型的客观唯心主义表现。

德王则不同，他虽受天命论思想影响，但其“自治运动”的精神支柱是他的主观战斗精神，天命论只不过是其一种神秘的外衣而已。这可由以下几方面来说明：第一，德王所谓继承祖业，兴蒙古于东亚，是寄托于他那朝秦暮楚、鄙弃民众的个人奋斗上的。这正象德王的部下陈绍武题词所写的那样，“时代使命注定

了我们的命运，逃避不可能，苟安不可能，要以奋斗的决心要求历史的前程。”⑩德王所讲的“天命”，指的就是这种逆历史潮流的“奋斗的决心”；第二，他否认认识与实践的关系，夸大精神力量，得出感觉意志决定一切的主观唯心主义的结论。比如他送人条幅时偏要选成吉思汗的“不怕路远而不走，只要走就能走到；不怕物重而不搬，只要搬就能搬动”⑪的语录。也正是这种主观意识的驱使，使他在解放前夕发出“共产党原来既没有一兵一卒，也没有一寸土地，赤手空拳，尚且搞起来了，我们有这么多人，还有这么多土地，就成不了事吗？我们绝不要坐等失败，一定要奋斗到底，最后总能成功”⑫的叫嚣；第三，德王的许多言论，并不是劝人去听凭什么冥冥中的“天命”来决定政治的兴衰，而是要人凭借主观努力去改变现实，用主观精神的作用去修补那已千疮百孔的封建制破船。德王以为世界上最重要的莫过于主观意识，有了它一切都会变得顺心如意，而且可以派生出新的物质世界，这是彻头彻尾的主观唯心论。

阶级社会中，在天命鬼神思想遭到沉重打击的情况下，进步思想家大都是以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来取代宗教和上天观念，反对唯心主义的。而代表没落阶级的思想家，有的继续宣扬宗教神学和天命论的唯心主义哲学，有的则竭力鼓吹精神万能，要统治者发挥主观精神的能动作用，从政治思想入手，来修补即将覆没的封建制破舟，德王属于后者。他为了挽回那即将失去的天堂，只能从维护封建剥削阶级的世界观中寻求出路，这是无可置疑的，也是合乎逻辑的。夸大精神力量，并不是说德王只限于在思想中打圈子，坐而论道，自我欣赏。而是说，实际上，他力图在实践中应用这些思想“起而行之”来改造社会，他的“蒙古自治运动”正是这一思想的外在形态。

其次，德王所导演的“自治运动”之所以以失败告终，是因为他用形而上学观点看问题的必然结果。

历史在前进，新事物必将战胜旧事物，这是事物的辩证法。作为顽固的封建卫道士的德王，不懂得也不承认这一理论。所以他在强大的历史潮流面前仍执迷不悟，迷信蒋介石政府的强大，慑于日寇的武力，羡慕美帝国主义的原子弹，根本无视日益增长的革命力量。他的阶级立场使他本能地鄙视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不敢承认事物的发展变化。因为承认这一点，就等于承认革命有理，承认他们的统治地位是可变的，这就等于在理论上宣判了他那个阶级的死刑。于是，形而上学观点便成了他反对革命、维护自己统治的思想武器。

由于德王不承认事物的发展变化，因而也不会理解量变可以产生质变，更不懂得事物的发展在于它自身的矛盾运动。这就是他脱离人民、反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敌视中国共产党，一味寻求靠山，或是依附于即将死亡的势力，或是投靠外国帝国主义，总把赌注压在别人身上的主要思想根源。解放前夕，乌兰夫同志常带函给德王，希望他归向人民，接受解放，但德王仍顽固地坚持他主张的所谓“自治”要求，不肯接受解放，并认为“共产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与国民党的地方自治有什么不同呢？反正他们都是汉人，反对蒙古人可能都一样。”这种把国民党与共产党相提并论、认为汉人均是搞民族压迫的绝对化的论调，从阶级观点看，它抹煞了两个阶级的本质差别；从哲学方面讲，它混淆了本质不同的两种事物，其二者都是形而上学的观点。这种否认差别的绝对主义的认识，在德王一生的言行中不乏其例，它是德王形而上学观点的主要表现形式，由于德王受这种思想的支配，因此，在历史的辩证法面前败了阵，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只有通过德王的政治活动来研究其哲学思想，才能看清这种思想在历史上的实际作用，才能深刻地识别那些为腐朽势力服务的谬论，才能脱离错误思想的精神奴役。

在一切意识形态领域内传统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希望旧

的思想传统根本不发生作用是不可能的，因为任何一代人总是在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开拓自己的历史活动。一切旧的传统，总会象恶魔一样缠着活人的头脑，只不过是它在不同的阶级那里所起的作用不同罢了。所以我们对旧的思想传统要有充分的估计和清醒的认识。今天我们对德王从哲学高度进行分析，主要是想告诉人们德王一生以悲剧告终的历史必然性，使人们认识到错误的指导思想对实际行动的严重危害性，从而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总结认识发展中的经验教训。

注：

- ① 卢明辉：《德王蒙古自治运动始末》，4页。
- ② 《内蒙古文史资料》，第一辑，28页。
- ③ 同上书，第五辑，7页。
- ④ 同上书，第六辑，189页。
- ⑤ 同上书，第一辑，46页。
- ⑥ 同上书，第一辑，7页。
-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2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 ⑧ 《内蒙古文史资料》，第六辑，186页。
- ⑨ 谭惕吾：《内蒙古之今昔》，117页。
- ⑩ 卢明辉：《德王蒙古自治运动始末》，220页。
- ⑪ 《内蒙古革命史》，173页。
- ⑫ 见《内蒙古社会科学》1980年，第3期，78页。
- ⑬ 费希特：《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哲学》142页，参务印书馆，1960年版。
- ⑭ 郭沫若：《十批判书》，89页，人民出版社，1954出版。
- ⑮ 卢明辉：《德王蒙古自治运动始末》，225页。
- ⑯ 同上书，385页。
- ⑰ 同上书，273页。
- ⑱ 谭惕吾：《内蒙古之今昔》，14页。
- ⑲ 卢明辉：《德王蒙古自治运动始末》，420页。
- ⑳ 同上书，494页。

选自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蒙古族哲学思想史论集》

我所搞“西蒙自治”运动经过

德穆楚克栋鲁普

一“西蒙自治”的名堂是怎样搞起来的

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包围北平，局势非常紧张的时候，蒋介石派来飞机把我接到南京。我到南京不久，国民党军又在淮海战役中溃败，解放大军很快地迫临浦口，国民党政府各机关呈现一片混乱状态，纷纷疏散迁移，此时我鉴于国民党政府摇摇欲坠，自顾不暇，而解放大军尚未到达西部盟旗，我正好趁此机会，搞“西蒙自治”，成立“蒙古自治政府”，与在王爷庙（乌兰浩特）的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相对立。如果站不住脚，也想打着“蒙古自治政府”这个招牌，经由青海、西藏去印度、流亡海外，周游各国，依靠美帝国主义支持，进行宣传蒙古问题，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发生，再行卷土重来，重上政治舞台，实现继续统治蒙古人民的迷梦。

我决定要搞“蒙古自治”，就偕同达穆林旺楚克、吉利占太、何兆麟、赵汇川及我的付官图们德勒格尔等，由南京乘飞机到达阿拉善旗。在南京临行时我去见李宗仁“代总统”辞行，并向他要了一个密电本，以资联络。路经武汉停留时，我即用电话与白崇禧联络，白即派汽车把我等接去，并设宴招待。在宴席间谈到和战问题，白崇禧说：“即便我们尚有一小块地方，共产党绝不允许我们存在，因此，必须备战言和。”我向白也要了一个密电本。